

第六章 精打细算,聚财高手 搜刮“模范”

“世路难行钱作马”，财大方能气粗。阎锡山之所以能够独霸一方，称雄一时，无疑是以必要的财力为后盾的。否则，即便他再有能耐也无济于事，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阎锡山在山西所搞的“经济建设”，表面看来似乎有声有色，实际上最多只能算得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山西是“模范省”，当然属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阎锡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模范”，才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正是靠着多方聚敛与搜刮，才满足了阎锡山实行统治和个人穷奢极欲的需要。

198

一 化公为私:阎锡山敛财的一个“秘密武器”

由通缉而送行

1930年冬我任察哈尔省主席时奉到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的命令，这是阎冯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的一个政治处分，当即通令全省各军警机关，一体查缉遵照办理。有一天，忽然接到内蒙古锡林格勒盟的省政府委员德穆楚克栋鲁普给我来电话：据哨所报告，截获一个可疑的人，据称奉阎锡山的命

令，为的是阎锡山打算逃往苏联，派他前往交涉假道出国。请示怎样处理？”我当即复电，嘱即将这人押解来省，旋又接到来电说：“因为看守者未加防范，这人乘隙潜逃无踪了。”我见电后，认为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又把这人放了。

过了几天，有一位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仲跻翰（又名墨园）在张家口省署投名片来访，因系同学，当即延见，但见他满面风尘，衣着褴褛，形容憔悴，不免使我大为惊异，因问仲说：“老学长，多年不见，何至一寒如此啊！”仲说：“唉！不用提啦！阎百川派我到苏联去交涉，他想假道出国考察，作为他下野的步骤，不料路经察境蒙旗内为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巡逻兵查获，将我的衣物行李和古瓶等并现洋200元，全部给我没收了，我见看守人松懈的时候，乘机逃出，徒步行走了好几天，沿途乞讨，才到了张家口，住在一家小店里，不敢出门，偶然听人说，省主席是你，我高兴万分。又想你原名‘一飞’不是‘翼飞’，便又大失所望。昨天晚间去洗澡，经过照相馆门口，见陈列着你的相片，却又是老同学你，才认清了，不是你是谁呢！所以我不揣冒昧的来见你，真是旧友重逢喜出望外。”我当即加以安慰，代为安置行装，赠以300元程仪，并写信给山西省主席商震让他返晋。

在同仲跻翰谈话中，他说这次去苏联，确实是商量假道的问题，没有其他任务，我说：“这样重大的任务，只给你二三百元的旅费，又仅仅预备仿古花瓶一对送人，显而易见，明明是阎锡山利用你，声东击西，暗渡陈仓的烟幕手段，你为什么要上他的当呀！”仲说：“我行前，阎锡山确实在太原。”并谈到他在山西省是任山西航空署长，山西所购的战斗机全系阎的外甥某一手经理买的，是意大利第一次欧战剩下的飞机，没有战斗效能，花的是大价钱买的是旧货。他的外甥却从中得到一笔很大的回佣金。因此阎的战斗机始终不敢在作战时拿出来使用。阎曾为这事，把

他的外甥降级。

不久，听说阎锡山侨装商人，已经离开山西，到了天津，张学良这时正在天津寓居在法租界他的公馆里，恰逢我有事要向张面陈，因此我到了天津见他。见后张对我说：“一飞你来得正巧，阎百川先生现在天津，大约明后天就要去大连，我若同他见面，怪不好意思的，请你代表我见他致以慰问，你就说我偶感不适，不能出门亲自去送行，问问他还需要什么东西。”我记得曾有人来陪同我到英租界可能是南桂馨的住宅和阎见了面，我当即对阎说：“我是代表张副司令来送行的，并致敬意。因张副司令偶感不适，不能亲来送行，表示歉意。”阎说：“请刘先生回去对汉卿说，我已嘱咐我的部下，要他们听从汉卿的话，服从他要像服从我那样，请汉卿放心好了。”并又加重语气说：“本来嘛，我不行了，就交给他，他不行了，就交给我。”

我回来，向张副司令转达了与阎见面和谈话的情况，我并问张说：“阎说的他不行了，就交给你；你不行了就交给他，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张没有回答我提的这一问题，一笑置之，就上楼去了。后来听人说，中原大战前，张阎之间，对于讨蒋，他们还有一段默契。

张学良下野出国，北平成立军分会，由何应钦代蒋主持。委员会成员的人选是由各方面派系所组成，其中有商震（晋系）、王揖唐（段系）、魏宗翰（段系）、刘翼飞、于梁忠、王树常、万福麟、鲍文樾、戢翼翹（东北系）、韩复榘、门致中（西北系）等三四十人，网络各派，优礼高薪，是一种政治安排。有一天，因阎锡山的父亲逝世，要在他的故乡河边村开吊，北平军分会派我代表各委员到太原去致祭吊唁，将要动身起行时，办事厅主任

鲍文樾约我单独密谈，鲍说：“--飞兄，中央打算分化我们东北军的团体，以号召开发西北为饵。正分别策动中，已对何柱国、王鼎芳（以哲）下手进行，他们一贯是用这种手段来分别拆散，以达到整个解决的目的，何王二人，我已与他们谈好了，不致摇动，但将来难保不发生其他阴谋，这是一件很可忧虑的问题，假若让他们把东北军分割遣制，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汉公呢？现在你代表各委员到太原吊唁阎父之丧，可乘这个不着痕迹的机会，便中分访你保定军校同学傅作义、赵承绶、李服膺、李生达等，探探他们的口气问问他们对东北军的观感。并去见见阎老西，用你个人的意思，表示汉公出国，东北军将校们愿意听阎百川的主张，请他们加以关照，采取一致行动亲密联系才好。”又说：“如老西有意表示好感，咱们好作有计划地进行联系，以免被人各个击破。介眉在太原，你去时可与他商酌。”（胡颀龄字介眉，是张学良派的山西省政府委员兼厅长，现在北平任参事。）我到太原后，又到河边村，住在赵承绶家里。我对赵说：“印甫如有机会，我想见一见阎百川，作一次恳切的谈话。”赵说：“百川自遭老太爷之丧，极为哀痛，他对孝子不出帏的古训，遵守甚严，纵然发引后，恐怕在近期内，也不能会见外宾。”我认为赵说这番话是代阎作遁词，不愿意正面和我谈话，但我却看见傅作义招待的贵宾，出入很是频繁，会见的人，不像单独来吊孝的样子，我便乘车去崞县，访晤好友李服膺同学。李也在家中守制，李所说的话与赵承绶相同，这时正是阎锡山取消通缉令不久，他必须加强靠拢蒋介石，不可能与东北军进行拉拢，东北军在他正在中原和蒋酣战时，从他的后边，忽然进关，使他遭到失败，他对这个宿怨恐怕很难冰释。因而我回忆起我在天津同他见面与他送行时，他说：“我不行了交给他；他不行交给我。”只是两句单方面找到寄托，对他则是不负责任的空话。看来我这次来到山西，难望达到

鲍志一和我说的那样圆满的结果，与阎很难求得合作谈话的机会，因此怅然而返。

何应钦在太原备受优礼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又有第二次太原之行，这时张学良已经回国，并已复职，这次是北平军分会派员校阅各路线沿途驻军。计胡毓坤、门致中校阅山东驻军，高维岳校阅京汉正太两路沿线驻军。因此我又再次抵达太原，阎锡山上次躲着不肯露面。这次则有所不同，频频来到我所住的旅馆访问，备致慰劳。当然我这时与上次的心情，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和他谈上次所要谈的话了。每天阎还陪着我到操场考试教练，最后何应钦也来了。阎按照欢迎陆军上将的军事礼节的仪式，大鸣礼炮若干发，表示对何应钦优礼备至，崇敬已极，校阅期间，我还乘阎的军用飞机鸟瞰了太原整个城垣的市容，这也是一种特殊待遇，驾驶飞机的，就是上次在张家口狼狈见我的那位老同学，山西省航空署长仲跻翰，校阅完毕后，在返北平的途中，我在何应钦的包房里对何说：“我想到石家庄以后，拟转汉口去看看张汉卿先生。”征求何的同意，何说：“好吧！”并问我对山西省什么感想，我说：“山西省是对日战争的第二道国防线，阎先生把大部分军队用来筑路，不专事训练，把兵工厂等兵需生产，改为纺织毛绒毛毡，这是他表示对中央不敢并行分庭抗礼的意思，但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猜想：他能从大连飞回大同，那不是简单的事，当然没有日本协助，是不可能的，这其中，他是不是和日本人订有什么秘密协定呢？”何应钦悠然不答，我意识到何与阎锡山的心，他们是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了。

同蒲路的来源

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系辛亥老同志）对我说：“阎老西不知他到底安着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又据欧阳工程师对我说：“阎老西真会作买卖，同蒲路的路轨、机车、客车全是比利时第一次欧战时用的轻便铁道的旧货，因阎在欧战前，在比利时国家银行存有一笔巨款，比利时因战后经济萧条，阎提不出现款，比利时以这些陈旧的铁路材料轨道、机车、客车等作为偿还现款，以抵阎的这笔存款，而阎把这些东西作为建设路政，繁荣山西经济之用。向山西人民说这是省有铁路，乃由省库收入项下支出这笔现金。这就等于山西人民替比利时还了这笔账，虽然比利时不还现款，而他个人丝毫没有受到损失，其心计之巧妙，于此可见一斑。又说：“阎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涵洞等工程他的估计与工程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大小弄钱的方法，他都要独吞，叫一般人作他的忠实的工具而已。”

（刘翼飞口述 胡君素整理）

二 阎锡山统治晋绥经济的核心手段

203

1930年，阎锡山反蒋战败逃往大连，1932年重返太原出任太原绥靖主任，面对1930年战后金融紊乱、百业凋敝、民穷财尽、公私交困的局面，在经济上采取了些措施。

首先设立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以当时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为副委员长，总管晋绥两省的经济建设事宜。在该委员会之下，设立经济统制处负责执

行具体工作。处长张之杰，曾留学日本学经济学，并曾任山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现将该处经办主要工作，简述如下：

整顿金融方面

1. 全省金融网的设置：在省一级除了山西省银行外，又设立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合称四银行号。在各县各设县银号。在村各设信用合作社。这样由省到县到村构成一套新的金融网。

2. 省一级的四银行号都各发行货币，改变过去由山西省银行统一发行货币，而成为四银行号分散发行货币。

山西省银行在阎锡山反蒋战前独占了发行纸币权。反蒋战时滥发货币，结果币值跌落，20多元纸币，还换不到一元硬币，而且币值跌落，与日俱增，一直不能稳定，因此造成金融紊乱，各行各业均不能正常进行生产。影响所及，百业凋蔽，公私交困，山西省银行的信用丧失殆尽。在此情况下，再由该行独占发行，人民自不乐于使用。所以才增设银行银号，改变为分散发行货币。对人民讲：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有同蒲铁路做担保；绥西垦业银行有绥西屯垦收益做担保；盐业银号有山西的盐产做担保，将来都不会再骗人，借以取得人民的信用，使人民乐于周使。这四银行号所发的货币，实际上就是阎锡山当日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3. 废除现金准备改用实物准备：已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采取六成准备以至六成以上准备的办法。四银行号这次发行的货币，废除现金准备办法，而采取了实物准备。在四银行号之上设立了“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归“山西省人民公益事业董事会”管辖。这个董事会是阎锡山的官僚资本的最高管理机构“山西省人民公益事业督理委员会”下

边的执行机构，董事长陆近礼是阎锡山部的一个老官僚。实物准备库由郝清照任经理。郝清照是商人出身，多年奔走权贵的人物。所谓实物准备，即是说四银行号的货币，不以现金为准备，而是以实物做准备。所谓十足准备，即是说四银行号的货币不是几成准备，而是十足准备。这样做同时也是验证阎锡山主张的“物产证券”。由实物准备库拿上四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相符。这样做便构成所谓实物十足准备。他不是先有现金准备而后发行纸币，而是发行纸币收进物资做准备，实际是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用他的一句话说，即所谓“口吹大洋”。这实在是一个巧妙的手法。

4. 省外汇兑的管理：如前所述，四银行号的纸币，实质上已经成为“管理通货”，而不再是货币的代表物。这种通货在省内周使，依靠政权自然没有问题，而在省外贸易上则又发生和省外通货的关联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设立了“山西省金融委员会”，即附设在经济统制处内，管理对省外的兑换事宜。凡是持有四银行号货币的人需要兑换外省通货的都须说明数量和用途，经过该会核准，才能兑换。这样便将汇兑的业务也掌握在手，同时达到限制省外货物自由输入的目的。

省外贸易管理方面

205

在这一方面，包括增加输出和减少输入，以争取对省外贸易的出超。

1. 实物准备库的进一步作用：如前所述，实物准备库有一个作用，是“收物发券”。但它的作用还不仅止于此，还有进一步的较大作用，就是收购物资，加工运销，牟求盈利。当时该库计划收购的物资，主要是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在产区设点收购，建库存储，加工整理，设法输出，善价而

沽。按当时山西输出物资，以粮食为首位。棉花、烟叶经多处提倡种植，产量亦有可观。就绥远来说，粮食、皮毛是出口的主要物资。这些物资过去均由私商经营运销，分享大利。实物准备库成立后，以雄厚的官僚资本，收购运销，自然可以胜过私商，把大部利润夺取过来。同时对外争夺销路，增加输出的力量，也可能增大。

2. 煤炭实行分采合销：山西煤藏丰富，称誉全球。开采出来，运销出去，便可得到大利。关于开采方面，属于大型的煤矿，均已早由官僚资本掌握，如大同煤矿、阳泉煤矿、太原西山煤矿，均已实行机采，分别由几个人管理，自采自销。力量分散，步调分歧。先是大同煤矿已试行分采合销，增大运销力量。至此又扩大范围，成立晋煤总销处，总管山西煤产的运销事务。该处的负责人是武锡桓。

3. 向铁道部交涉减低煤炭运费：正太铁路局对煤炭运费，规定等级偏高，对阳泉、寿阳、太原各煤矿所采的煤运销省外，很有不利。为此交涉减低，以利输销，也是当时的一件重要事情。经济统制处为此曾撰写文稿，刊在山西各报，从舆论上广为宣传，一面直接向铁道部交涉，减低运费，以期利于输出。以上是增加输出方面的一些主要措施。

在减少输入方面，采用如下的一些办法：

1. 大力宣传提倡服用土货：在经济统制处成立之初，即努力于这一工作。撰写论文，编印小册，广为宣传。经济统制处的工作人员则以身作则，服用土货，以为倡导。结合当时人民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渐觉醒，经过这样努力，却也造成了服用土货的风尚。

2. 开设“土货商行”：为了适应服用土货的风尚，在太原市开化市对过热闹市区，开设土货商行，专门经销晋绥两省土产物

品，供应人民的需求。土货商行并曾发行“土货券”，作为该行售卖物品的专用货币。实际上这也是由该行验证物产证券。土货商行用土货券收进物资，再凭土货券向该行兑换物资。土货商行的经理先后为彭上弘、张文同。

3. 控制省外汇兑：如前所述，四银行号纸币只能在本省境内周使，持有的人要想汇出省外，买进物资，需经山西省金融委员会核准，这样便可以管理住汇兑，限制了省外物资的输入。

经济统制处成立于1933年，迄1937年日本侵占太原前夕结束，先后凡五年。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些。

(郭文周)

三 两个600万元外汇中的花样文章

1930年(民国19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的北平国民政府随着军事的失败而归于消灭的时候，阎锡山在山西也无法立足了，他不得不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化装秘密离开他的老家，逃亡到大连去托庇于日本人。

阎锡山从辛亥太原起义以来，一直掌握着山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然而山西毕竟不是一个殷富的省份，底子太差，所以10多年来，阎锡山虽然竭尽搜刮之能事，但绝大部分财力都花费在加强部队实力，特别是花费在建设兵工厂方面。他本人手里的现款，还没有像解放前夕那么多。他想到那些追随他多年的高级干部生活相当清苦(连将领吃空额的机会也很少，他用三联单的方式来控制缺额，上午开缺一个，下午就得呈报；在作战时，每师每次动员只发2500元，包括在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等费用在内)，所以在临行之前，曾在基本干部中间，个别地分了一些赃。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都分润了一些。

如赵丕廉、朱绶光、贾景德等都给了三五万元，将校给了一万、二万（给了我二万元）。一共破费了他八九十万元。这笔钱，与其说是给部下的照顾和留念，不如说是给他自己将来重归老巢预先铺平道路，虽然那时候，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10个月之后就又回到太原来。

阎锡山自己在临行时从山西省政府提走了两个600万元：一笔是现款，他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了老头票（日币）；另一笔是在八年前结汇存在德商银行，原是预备向德国购买兵工器材的。

阎锡山在大连郊外滨海地区的黑石礁寓所里住了10个月，连同支付各方的活动费，一共花了300多万元。可是他的财运很好，在他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之外，当机立断地翩然从大连飞回大同的前夕，老头票忽然大涨特涨，又以一倍多一点的汇率换成中国钞票，竟一下变成了600多万元，连本带利带回来。所以他不仅在大连白吃、白住了10个月，连给各方面的活动费，他从日币汇率的波动上捞回来了。

至于存在德商银行里的600万元，德国看见阎锡山垮了，认为他从此不能重登政治舞台了，便拒不支付，存心想赖掉这笔账，阎锡山回到太原后，仍然不付。他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直到后来政局稳定，才承认了这笔钱。

可是德国银行仍然不甘心把大笔现款归还给阎锡山，认为这笔款子是山西省政府的，省政府可以用这笔钱向德国购买各种路矿器材。结果，山西省政府买进了一批铁道器材，用来铺设同蒲铁路。在这以前，由于阎锡山的保守思想和自卫政策，在建筑正太铁路时就采用了“内交通外不交通”的原则，路轨、车辆都是窄轨的。所以德商也提供了窄轨铁路器材。但这600万元的器材是单单供给同蒲铁路南段应用的呢，还是供给全线应用，却记忆不清了。

（芦丰年口述 功良整理）

四 为争夺天津《益世报》大打“持久战”

意大利人雷鸣远，系天主教神父，先在河北省安国县设立天主教兄弟会骗取中国人入会，用廉价购得人民土地，由兄弟会修士们耕种，名为自种自吃，实际雷是大地主。民国初年凭借教会势力，用劝募和捐赠股金方式，集资在天津意大利租界创办《益世报》（馆址现属建国道），雷兼该报董事会董事长。逐步发展为天主教会在中国最大的机关报。内部职员大多数是教会中人，经理刘俊卿死后，由其弟刘豁轩继任。1933年，雷以刘违犯教规免职，调任该报驻上海新闻记者李渡三为经理。李系山西太原人，与阎锡山有世交，李的岳父郭耕莘，以教友身份充《益世报》董事会董事，与阎亦有交谊。李与我因朋友关系介绍认识雷鸣远，并自1935年起聘我为该报常年法律顾问，议定年支公费200元，每日下午到报馆并管吃一顿晚饭。雷常往来天津、安国间，来津即住在报馆，经常面谈，他常以假慈善面目欺骗中国人民，诬蔑共产党不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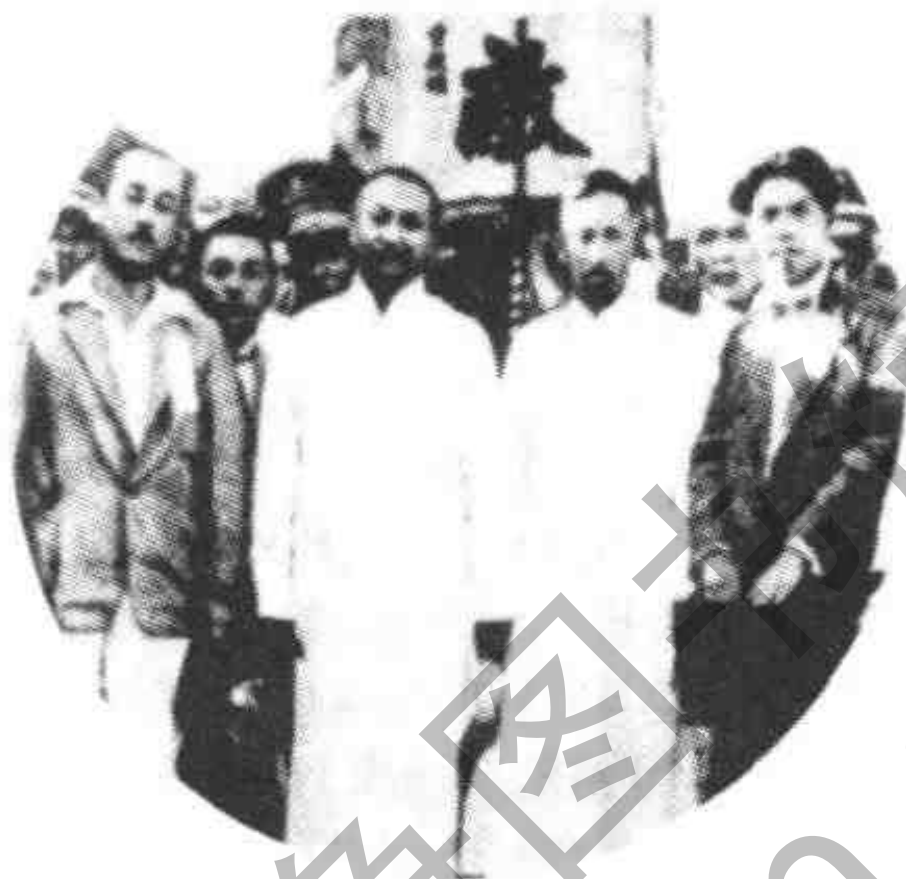
在李渡三当经理后，雷因安国兄弟会需款，考虑到他在《益世报》的历史情况，个人占有股金多寡和有无股金，均不足以影响他的控制地位，即经李介绍，将雷鸣远名下的股票共35000元（每股10元，占全部股票半数以上），洽卖给阎锡山，阎在扩大会议前，曾在北平办有《民言》、《北平》两日报，1931年卷土重来仍为山西王，并未忘情这个重要宣传工具，因此一拍即合。但阎非教友，按该报规定非教友不能承购股票，阎即由其在天主教会的侄子阎孝文出面，购买了这一项股票。不料雷视该报为禁脔，事无大小，不让阎孝文过问，当时雷曾对我说：“股票虽卖，而股权不能放弃。”阎锡山以阎孝文能力不够，即派其弟阎印封

代表阎孝文行使股东权利。阎印封家住英租界（现在的常德道），经常到法租界太丰里阎锡山的亨记银号内，其妻在阎锡山左右是个红人。阎印封自代表阎孝文后，移住报馆内，逐步与李渡三拉拢，乘 1936 年董事会改选机会，取雷鸣远的董事长而代之，因此雷深恶李渡三，阴谋对策。

在该报馆担任教授武术的职员丁茂昌，系帮会中人，地痞流氓的朋友不少，在雷的拉拢指使下，于 1937 年 6 月 5 日早，李渡三上班前，由丁率领七八个彪形大汉，把住报馆大门，候李到后，气势汹汹，不让进门。李鉴于雷在意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势力，又有这一批打手，不敢抗拒，雷即改派天主教会培养的法国留学生宝堂担任经理，李即与阎印封洽聘律师乔逢仙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雷鸣远侵占，并申请处分，准备用法律手续先行接管报馆业务，听候最终判决，我与雷、李两人相处都不错，不愿卷入漩涡，即约专写该报社论的罗隆基出头调停（总编辑为解幼璞，是靠近雷的人），嗣因雷态度强硬作罢。雷另聘律师朱道礼代理诉讼。不久，法院先以裁定准许李渡三处分申请，在执行时，意租界工部局拒绝协助法院执行，法院不能行使职权，李未能接管。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法院被炸，诉讼因而中止。李返回太原向阎锡山报告，阎印封仍留天津相机应付。

210 生宝堂妻系法国人，原有存款近 3000 元，自接任经理后，更加得意忘形，常同该报馆秘书史潜淑乘汽车过万国桥，到英法租界各娱乐场所游荡，彼时万国桥北头有日兵值岗，盘查行人，是年 8 月 11 日生等过桥时，自称是海关职员出外办公，经日兵查明不符，被带至海光寺日本兵营，不久以有抗日嫌疑，转送日本宪兵队羁押。《益世报》从此停刊。雷鸣远迁居安国。

抗战期间，雷在“蒋管区”内被日军击伤，死于重庆医院，由于斌主持《益世报》，暂在重庆出版。



阎锡山拉拢新闻界

1942年，天津西开天主教堂主教文贵宾（法国人）找李渡三来津，会同该报董事孙子寿，监察肖天如，负责清理该报所有财产及欠内欠外债务，清理处设于旧法租界天增里18号我的律师事务所内，聘我为代理律师。李乘此机会伪造单据，虚报开支，并将价值昂贵进口的新式印报机，拆毁当废铁出售，仅卖伪联银币20万元，一并吞没，欠债及股本均未偿还。抗日胜利后，李渡三先与于斌接洽复刊，于早已不信任李，对拆卖印报机一事，更为不满，即派刘益之来天津筹备复刊，李闻讯，乘刘未到前，先在原馆址附近李的家中，设立“天津益世报复刊筹备处”，由曾充《益世报》编辑的吕鸿基介绍其舅父杨振鄂参加筹备复刊工作，杨系军统重要分子，刚从重庆飞来，李意图借军统势力，一面与于斌对抗，一面包庇奸使之交付复刊费用。李在敌伪时

期，曾充任伪太原市政府情报主任，与杨合作后，任军统平、津、保、唐特别组天津站站长，并介绍曾充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徐树强为唐山站站长。旋即将复刊筹备处内人员，一律参加以戴笠为首的天津市汉奸财产调查委员会内。嗣杨振鸮令徐树强交付现大洋 4000 元，带赴北平，贿赂当道免除其汉奸罪名，事发被扣，李渡三因失去军统的靠山，即找阎印封妻先行垫付法币 100 万元，暂行维持筹备处的公杂各费，一面函请阎锡山从速拨款备用，阎复信说：“只要《益世报》能出版，我拿出多少钱都行。”同时以阎印封未在天津，并托其老友赵子贞（东亚毛织厂董事）代表阎印封会同李渡三筹备复刊。一面嘱托亨记银号的李子丰就近协助。李渡三向我约定，事成以我为副经理。

1945 年 11 月初，于斌派来筹备复刊的刘益之到达，探知李渡三挟阎锡山的势力，继续谋夺《益世报》，与李洽商合作办法，李不同意，并将复刊筹备处迁移至旧日租界山西路阎锡山的楼房内，于斌即洽经南京政府支持，由天津市长张廷谔就近大力协助，在和平路锦州道转角，设立《益世报》馆，先由某印刷厂承印报纸，于是年 12 月 2 日复刊，以吴克斋为经理，刘豁轩为总编辑，取消董事会制，派刘益之在南京设立分馆。从此明目张胆宣传反苏反共，成了蒋介石的御用报纸。当时为了敷衍李渡三，每月由《益世报》支付给生活费法币 20 万元。1946 年春，李即以汉奸罪名被天津市法院逮捕羁押，是否系于斌左右所策动，无从证实，但阎锡山因内线已断，一场争夺，从此闭幕。

（苏明文口述 赵钟璞整理）

五 “一人得道，仙及鸡犬”：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

我和阎锡山同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起初经阎锡山的表兄

曲清斋介绍，到太原督军公署密电室任译电员工作，以后升任中校秘书、上校参事、军用实物补给处副处长，以及在阎锡山官僚资本企业山西贸易公司天津分公司及晋兴企业公司担任经理等职，为阎锡山反动统治集团服务，前后共达 27 年之久。本文先将阎锡山家族所办的企业，按照时间先后加以介绍；至于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的官办企业，容再另文撰写。

北 洋 时 期

（一）30 万两银子的一笔“绑票”

阎锡山在掌握了山西省政权的初期，得悉山西祁县“万财主”渠筱洲家中存有巨额的现银，遂挖空心思打渠家的主意。他后来了解到太原商会会长、山西省议会议员渠本澄是渠筱洲的族侄，就胁迫渠本澄去祁县向渠筱洲借银子，并派亲信卫兵 10 余名随同前往，将“万财主”的住宅包围起来。渠筱洲起初坚不同意，后经开枪威胁，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允借予现银 30 万两。阎锡山就用这样“绑票”方式得来的银钱，去充实山西省银行。阎初派阎竹圃（祁县南路人）为山西省银行经理，齐孟彪（定襄县北路人）为协理。1917 年至 1918 年间，山西省银行内部因南北路的派别发生意见，阎竹圃辞职。阎锡山遂让他的叔岳徐子澄（原任山西粮服局局长）兼任山西省银行总理。自此，阎锡山在军政费的开支外，特规定一项他本人的机密活动费，在山西省银行开支。按山西省银行本属于官僚资本的企业，但是阎锡山利用这个省银行的资金，充作他私人活动的用费，故此必须在这里加以叙明。

（二）阎氏家族早期的商号

阎锡山之父阎昌春于前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左右，在河边村开设小杂货铺，并出了一些钱票。后来由于所发钱票过

多，发生挤兑，杂货铺因此倒闭。阎父被迫变卖家产，以填补亏空。后经其友人曲长和借给他 200 吊钱，才保留下几亩地和几间住房。1920 年间，阎昌春在河边村先后开设庆春茂及庆春泉两家商号。阎家的堂名是“庆春堂”，所以这两家商号均冠以“庆春”二字。庆春茂的资金为 2000 元，由曲和亭任经理，除经售绸缎、杂货外，并出钱票和经营高利贷。庆春泉的资金为 3000 元，由我叔父阎愈荣任经理，经售米、面、杂粮，亦出钱票，另设烧锅、粉房，造酒和制做粉条，并利用粉房的粉渣、烧锅的酒糟饲养猪牛出售。庆春泉于出钱票时，阎昌春曾暗地吩咐阎愈荣说不兑现。某年腊月二十一日有一穷汉曲富天禄，持 500 文钱票一纸到庆春泉兑现，阎愈荣未允兑给。曲富天禄愤怒之下，即在庆春泉门首以鞋底捶打那张不能兑现的钱票。阎昌春闻悉此事后，竟责问阎愈荣说：“河边村只有这一个穷人，你为何不兑给他？”因此，即将阎愈荣辞退。阎愈荣因遵照财东的指示办事，竟被斥退，以致愤懑成疾，一年余即故去。庆春茂经理曲和亭，后来也被阎昌春以曲的年岁大了，且以柜上应酬客人花钱过多一些为理由，加以辞退。但是实际上是因曲和亭在号中年久，报酬过高，故而被辞的。

山西五台县是个穷苦的地方，河边村也不例外。那时村里开设的几家商号，都是自财自本自当家，为了节省开支，在柜上不另立伙食。阎昌春在河边村开设的庆春茂、庆春泉两家商号，共有店伙 20 余名，也随旧例，不立伙食。规定三年算一次小账，五年算一次大账，伙计、东家是按四、六成分红，即身股四成，财股六成。凡未定生意股份者，在年终酌给津贴，最多亦不超过 50 元。伙友们讽刺说：“我们河边村的买卖，是齐年三顿饭，早晨羊肉白菜饺子，中午猪肉韭菜包子，晚上是油茶月饼。”这就是说，大年初一是饺子，五月端午节是包子，中秋节是油茶月

饼，这就是全年在店里吃的三次饭。这也足以说明那时阎家商号对待店伙的苛刻。

1919年间，阎锡山以他父亲阎昌春的名义，在太原龙王庙街成立了铜元兑换所，任其亲戚徐西川（又名徐振渭）为经理。这个兑换所用现洋兑换铜元，无本取利，同时兼营高利贷，几年后就积累了不少的资金。1924年间更名为源积成银号，扩大了业务范围，接受存款，规定存款满300元者为“一份子”，利息较高。因此，太原的各级公务人员，以部分薪金在该号存放份子钱者大有人在。该银号利用这种存款投资于其他企业，获得的利润更大。

1920年间，阎昌春派其襟弟阎长卿（阎锡山的三姨夫，我的六祖父）在忻县城内接办聚丰泰钱庄，由阎长卿负总责，另任赵汝奎（原聚丰泰的掌柜，忻县人，和阎长卿有亲戚关系）为经理。忻县是晋北最繁华的城市，城内商号林立。阎家利用官府的势力，接办聚丰泰出放高利贷，其能攫取厚利，自不待言。阎家同时又在太原通顺巷开设德生厚银号，派聚丰泰钱庄的职员张雨田任经理，卢培庭为副理（张、卢二人均系忻县人，且和阎长卿友好）。阎锡山拨给德生厚银号资金10万元，但是指定这10万元系川至中学的基金，交由该号运用，关于川至中学的固定开支，必须由德生厚银号担负。

（三）阎锡山控制企业的手段

阎锡山经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实际上在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利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以便由他操纵支配，而且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例如徐士琪是阎的内弟，赵戴文的门婿，徐子澄的三儿，由阎保送去日本留学

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密切的。但是阎委任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总经理的同时，又委同徐士珙闹意见的曲宪南（阎的表侄）担任协理，借以牵制徐士珙。彼时曲宪南担任西北实业公司营业处处长，他对我表示不愿担任这个协理，要向阎辞职。我提醒他说：“你是长官（指阎锡山）的协理，而不是徐士珙的协理。”曲宪南方打消辞意。

（四）阎锡山开设的银号、当铺等企业

阎锡山用“绑票”手段勒索到白银30万两，为山西省银行的资金打下基础后，他认为山西省的富户还不在少数，就通令各县县长动员境内的富户“革命救国”，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时经一年之久，收集到的捐款仅八九万两，内中尚有一部分现洋。阎锡山即用这笔款于1921年在太原设立晋裕银号，聘李刚甫（崞县人）为经理。李刚甫与阎父系属至友，任晋裕银号经理后，对阎父逢迎备至，并经常代为做些买空卖空的生意，获利甚厚，更得到阎父的欢心。

晋裕银号于1924年前后出资在大同、忻县等四个县城各设了一个当铺，即大同县的晋同当、忻县的晋忻当、临汾县的晋同当和洪洞县的晋洪当。每家由晋裕银号拨给资金一万元，另由各该当自行发行纸币三万元。

216 约在1928年至1929年间，晋裕银号复出资在太原成立了晋裕粮店及晋丰面粉公司，在临汾成立了收售棉花的晋同花店。1933年前后，晋裕银号又出资在大同成立了晋同银号，在太原成立了元丰银号。七七事变后，晋裕银号停业。日寇投降后，晋裕银号在太原复业，仍由李刚甫任经理。李于1946年病故，经我向该号董事长曲宪治推荐，由天津亨记银号驻绥远主任冯子久任经理。

晋裕银号经理冯子久，后来将所有属于该银号支持下的一些

企业的资金，全部兑到上海，购换了黄金、美钞，待机运用。这项巨额资金，最后均交与阎锡山了。

1921年，阎锡山在太原开设斌记五金行，即任其侄阎述先为经理。因为阎述先对于五金行的生意一窍不通，几年中业务毫无进展。那时榆次县流行这样两句谣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二千年才出了个贾俊臣。”阎听说，就通过他的叔岳徐子澄的了解和介绍，聘贾俊臣为斌记五金行总理。贾俊臣担任总理后，就取得阎锡山的同意，扩大斌记五金行的组织，并在天津、上海设立办事处。他一面拉拢山西兵工厂厂长李寿庵和工程师、技术员等，一面拉拢天津、上海等地的礼和、西门子、安利、禅臣等洋行和聚兴成五金行等。自此，所有山西兵工厂的成套机器设备以及军火原材物料等，均由斌记五金行经手，代为订购。天津各洋行也派员常住太原，如禅臣洋行的吴明焯、曾伯杰，礼和洋行的米禄斋等，在太原设立办事处，专门和斌记负责人贾俊臣、阎述先等联络，接洽生意。

（五）阎氏家族增设的商号和粮店

1927年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先后增设了营业公社（经理曲隆富）、思远源（经理曲隆登）、积厚长（经理曲隆虎）和协同兴（经理曲全治）四家商号，每号由阎拨给资金五万元。各家都是经售绸缎布匹、洋广杂货并兼营高利贷（这四家商号加上庆春茂和庆春泉，简称为阎家河边村的“六大号”）。这四家商号正在筹备的期间，我由北平函电处请假回家。当时阎锡山正在河边村，他知道我熟悉天津情况，便派我带着四家商号所派的人员到天津去买货。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来办货，不知道应该买哪些货。我除了告诉他们应该挑选些大路货和易于出售的绸缎、洋货之外，还对他们说：“我们家乡面粉每袋二元九角，这里二元一角，总买的话还能便宜些。我负责给你们从天津的山西采运外通融火车

皮，不花运费运回太原，一袋如赚五角，一万袋就是5000元，这生意还赔了钱吗？”他们都高兴地说：“就这样办吧。”我便去找山西采运处驻天津的主任李尊九，说明阎总司令在河边村的商号来天津买下一万袋洋面，还有些绸缎、洋货等，请他在采运处运货的车皮内多要一辆，或随采运处的货车一并运回山西。李尊九认为洋面多少不成问题，就是绸缎、洋货不是军用物资，让路局看见提出质问，就不好办。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把绸缎、洋货等装到木箱里，随军用物资装在一个车皮内，运回太原。

从此以后，河边村的“六大号”就经常派人来往于天津、河边村之间，利用采运处的车皮，把他们所购的货物运回太原，再利用太原汽车管理处的汽车运到河边村。他们在天津购买的绸缎、洋货等，因为不花运费，所以价格比太原市面上的价格还要便宜些，而且货色新鲜，易于销售。因此忻、定、台、崞等县城的商号都纷纷到河边村买货，从此河边村也就成为繁荣的集镇了。

在山西五台和崞县之间，有一条名叫“金沟”的沟渠，距河边村约有30里路，山里泉水冲刷下来的沙泥中，含有金屑。附近居民即从这条沟渠里，采取金屑出售。庆春茂、协同兴两家，均经常派人去当地以低价收购，积有成数后，再到太原或忻县卖给首饰店，获利甚大。据庆春茂经理惠富治对我说，该号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买到金屑20余斤，卖出后所得的净利，较放高利贷更为优厚。

约在营业公社、思远源、积厚长、协同兴等四家商号成立的同时，阎昌春在大同城内开设了元丰粮店，任李万春为经理（李是定襄县芳兰村人，和阎有亲戚关系）。大同是晋北一带的产粮区，可以买到大批粮食和油料等农产品，既便于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又能够以小价收买，大价卖出。

（六）在河边村成立源记的由来

阎家开设了 10 余家商号后，阎锡山惟恐各商号营私舞弊，遂在河边村成立“源记”，派曲清斋、阎福斋（阎的族兄）和阎长卿三人共同负责，专门稽核各商号的账目和盈亏，向阎锡山报告。自此，天津的亨记银号，太原的德生厚银号、源积成银号、营远汽车公司、斌记五金行，忻县的聚丰泰钱庄，大同的元丰粮店，河边村的营业公社、思远源、积厚长、协同兴、庆春茂、庆春泉等 13 家商号，都须于每年年终造具清册，由负责人亲到源记分别向曲清斋等三人详细地交代。曲清斋等三个老者，均各有一些经营管理买卖的本领，对各家报来的清册，都一一仔细地审查核对，而且常是三番五次找寻差错。各家经理们背后说：“每年过三关（指过这三位老人的关），真感到头痛。”只有斌记盈余多，该号经理贾俊臣过三关比较容易。

此外，阎锡山为了加强对他的家族企业的管理，又成立了所谓的“董事会”，由曲宪治、樊象离、陈子壮等五六人组成，曲宪治为董事长。各商号的营业、盈余及分红等，均须向董事会报告，在得到核准后，方为有效。分红的成数，均按照“财股六成、身股四成”的原则办理。由此可见阎锡山在其家族企业上花费的心机，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国民党时期

（一）阎锡山在北平、天津的经济活动

1928 年阎锡山占据北平、天津后，即组织了北平日报社，任朱点（又名朱异三）为社长，另外成立了民言日报社，任方闻（又名彦光）为社长。同时，阎家的企业也蜂拥而来，图谋乘机夺取暴利。源积成银号、德生厚银号、晋裕银号都派人到天津成立驻津分支机构，以高利贷为主，兼营汇兑等业务。太原斌记五

金行亦在津设立办事处，此外，河边村的“六大号”亦均相继派员来津，捞了一些厚利。

1930年8月阎锡山与汪精卫在北平组织扩大会议时，曾拨出100万元，在天津开设建设银行，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王子寿到津聘请了山西平定县人黄益臣（黄是天津官银号的老手，在天津银钱业颇具声望）担任经理，王任副经理。未几，扩大会议失败，阎锡山即由天津建设银行拨给汪精卫40万元，汪随即携款逃往国外。

天津建设银行于1930年9月1日开幕后，于当月18日即行垮台。该行资金100万元，除拨给汪精卫40万元以及开幕前后花用外，仅余50万元。该行结束后，遵照阎锡山的指示，以所余的资金50万元转入地下，在天津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泰丰里三三号组织了亨记银号，半明半暗地进行活动，仍以黄益臣为经理，王子寿为副经理。亨记银号自成立起至1949年这20年中，逐步发展到太原、绥远、上海、兰州、西安、成都、昆明等地，直至天津解放始结束。

（二）阎锡山下野时搜刮的一笔3000余万元巨款

1930年阎锡山从平津撤离前，曾命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梁巨川，将晋、察、冀、绥、平津等地搜刮到的现金3000余万元，提出交徐子澄保管一部分，交源积成银号徐四川保管一部分，其余大部分交其侄儿阎达仁保管，分存于天津殷实可靠的银行银号，做为他下野的活动费用。他准备下野时，对所属的军长、处长以上的官员和军政方面的亲信，每人送给一万元至三五万元不等。当时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处长兼密电处处长高管城，阎曾送给他一万元。彼时高曾对阎表示忠诚，并说：“虎走山还在，山在虎还来。”这是高管城后来告诉我的。

（三）阎锡山妄想发财的一段趣事

1929 年间，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梁巨川在北平的时候，有一清室的太监名赵德山者密告梁说：西四牌楼羊肉胡同七号是清朝某王府的宅第，那里地下埋藏着很多的银子。梁即据情告知阎锡山，阎就决定设法用大价将这所住宅买到手，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三万元，经梁派



阎锡山像个土财主

卫兵一排住于宅内看守。当年 8 月开始动工，在该宅内四处挖掘地洞，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并逐月将情况密电向阎报告。当时挖地洞的工人约 20 余名，许进不许出，夜以继日地进行挖掘。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七号住宅的地下全部挖遍了，也没有挖到银子，而地里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用抽水机排泄出去，以致附近的街道上，满街都是泥水。王子寿把这些情形向阎锡山报告后，阎复电要将六号或八号的房子再设法买下，继续施工。王子寿于是又将羊肉胡同八号住宅用三万二千元的大价买来，继续动工挖掘了半年之久，始终没有挖到银子。那时王子寿给阎锡山的电报，是由北平函电处代为译发的，都由我一人经手，所以这件事的经过，我知道得很清楚。王子寿还对我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不但银子没有挖到，反而花了 10 来万元！”

（四）禁烟考核处的内幕

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时期，曾一度按照禁烟禁毒条例实

行禁烟。1932年间，阎锡山又重申禁令，表示要决心肃清山西境内的大烟、白面，特委派马骏图为禁烟总办。那时黄国梁（字少斋，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的侄子黄泰清，倚仗黄国梁的势力，仍在太原贩运毒品。阎锡山耳闻此事，即支持马骏图派员前往黄泰清家中查出大量毒品，当将黄泰清逮捕，按禁令执行枪决。此事轰动了山西全省。但是，山西禁烟一事，表面上虽然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实际上恰恰相反。1933年，阎锡山委任靳祥垣为太原、大同禁烟考核处处长，名义上虽是禁烟，而暗中是大量收购大烟，加工改装出售，并且居然名之为“戒烟药饼”。这种“戒烟药饼”按烟的成色分为“甲字”、“乙字”、“丙字”三种，每种均有5两、10两、20两、50两及100两的包装。售价甲字者每两二元五角，乙字者每两二元，丙字者每两一元六角，人人都可任意购买，不过吸大烟者需要登记，登记时应即购买这种所谓“戒烟药饼”。禁烟考核处除径向绥远、兰州一带大量收购烟土外，尚委托绥远的晋业祥及大同的晋同银号两家代为收购大烟兼代加工制成“戒烟药饼”。

晋业祥是阎锡山于1933年前后在绥远设立的商号，经理为郝荣甫，是专门收购大烟的。阎锡山在大同所设的晋同银号，表面上虽说是做倒把生意的银号，但骨子里也是以替禁烟考核处收购大烟作为主要“业务”。

禁烟考核处一面在山西境内出售大烟，一面派靳祥垣到天津推销。1930年阎锡山下野，来到天津准备去大连，靳祥垣随阎到达天津，开始与我相识。1932年前后靳祥垣来天津推销大烟时，曾表示希望我能代为销售，我拒绝了他。随后我介绍山西人赵子青和靳祥垣商洽代销烟土事。靳祥垣随即返回大同，我亦因家事请假回河边村，所以他们这笔大烟买卖究竟成交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后来靳曾对我说：“赵子青对我们的事很帮忙，虽

经过不少的周折，结果我们还满意。”

（五）成立大同矿业公司之始末

1932年阎锡山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任梁航标为经理（梁航标即梁巨川，因阎锡山号“百川”，梁遂将名字改为“航标”），任梁上椿为副经理兼任大同矿务局局长，续子宪任副理。

梁巨川在1927年间充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时，关于山西军政费的开支，即使经阎锡山划行后，仍必须经过梁巨川审核允准，方能支款。而梁常以经费支绌为辞，加以克扣，以致引起军政方面人员的不满。实际上，这不过是阎、梁二人串通一气的鬼把戏而已。当阎锡山化装潜伏在天津，由日寇掩护做下野准备的时期，我在天津电台收到太原拍来一电，大意是说：“梁巨川和赵戴文以及随从人员由太原动身，约在明日到达天津。”我将电报内容向阎锡山报告时，阎的二太太徐兰生脱口而出地说道：“各方面的人都骂梁巨川，我们下野还带梁巨川干什么？”阎锡山说：“他们不知道梁巨川的好处。”后来梁巨川随阎回到山西后，阎就叫他和大同矿务局局长梁上椿、阳泉矿务局白云轩等，洽商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将大同、阳泉的煤炭尽量外运，由大同矿业公司向天津、上海、日本等地推销，其中大部分是经塘沽出口运往日本，供给日本工业应用。当时由于铁路车皮较少，运输困难，致使该公司煤炭运销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其所积累的资金已属可观。该公司后在天津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以18万元购置一所大楼，另在旧英租界三十三号路新建华美的楼房数处，经副理等每人一所。即此亦足见该公司获利之巨。1934年间，梁巨川和梁上椿两人意见分歧，不能合作，阎锡山遂调梁巨川回太原充任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即由梁上椿任经理，续子宪为副理。

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太原相继沦陷，梁上椿即将天津大

同矿业公司职工全部解散，宣告停办。

(六) 营远汽车公司

1928年间，阎锡山以两万元的资本，在太原设立了营远汽车公司，任阎进文为经理，经营由太原至侯马及太原至大同的客运长途汽车业务。此外，山西汽车管理处等单位购置汽车时，均由营远汽车公司代为购买，俾便从中取利。山西省所用汽车，过去一向是向安利洋行订购的英国的雪佛兰牌汽车。营远公司成立后，天津公懋洋行的推销员高敏时来到太原，推销该行经理的美国道济牌汽车。高敏时了解到阎进文与阎锡山关系密切，同时对于汽车业务毫无所知，乃竭力笼络阎进文，终于把道济牌汽车推销到山西，并且夺取了雪佛兰牌汽车在山西的销路。高敏时因此也由推销员一跃而为公懋洋行太原分行的经理。

1935年间，阎锡山曾由公懋洋行在道济汽车厂订制了一辆保险汽车。1945年日寇投降后，公懋洋行又选了一辆最新型的小汽车赠与阎锡山。但是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正太铁路中断，汽车不能运至太原。公懋洋行董事长甘成恩（美国人）遂包用民航公司一架最大的运输机，亲自把这一辆新型的汽车运赴太原，并带去大量的新鲜鱼虾、螃蟹和水果等礼物，送给阎锡山。阎为了表示感谢，以贵宾之礼设宴款待甘成恩，并和甘成恩并肩摄影。

(七) 太原营记公司

1933年春，阎锡山见到孔祥熙的祥记公司经理亚细亚的油类大发其财，不禁见猎心喜，遂集合亲信李鸿文（山西省财政厅长）、孔繁蔚（阎的总参议）和阎进文等计议，决定效法祥记公司，在太原设立营记公司，代理美孚、德士古两油行推销油类。阎锡山指定营远公司、庆春茂、思远源、协同兴和积厚长等五家，每家出资五万元，由李鸿文与孔繁蔚二人各出资两万元，赵丕廉出资一万元，共计资本30万元，任阎进文为经理，秦希白

(李鸿文的亲信)为副理,另在天津成立驻津办事处,任孔子正(系孔繁霖的侄子)为主任。一切安排就绪后,李鸿文、孔繁霖、阎进文相偕来津,设宴邀请美孚、德士古两行的负责人,商洽代销事宜。不料李等在津奔走了一月之久,而美孚、德士古两行均一味敷衍,毫无诚意。他们三人终于不得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太原沦陷前夕,营远公司和营记公司的重要职员,均迁至四川成都,改名为裕文汽车公司,仍和美国公懋洋行联络,由仰光进口汽车并经营由成都至西安长途汽车业务,均获得优厚的利润。1943年裕文汽车公司阎进文赴克难坡(克难坡原名为南村坡,在山西吉县境内,约在1938—1939年间,阎锡山在该地设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改名“克难坡”)向阎锡山报营业情况时,阎锡山夸奖说:“所有的公营事业和我自己的银号企业都赔钱,只有你在抗战时期还能赚钱,你的本事不小!”

抗 战 时 期

(一) 所谓“军用实物补给处”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家族所办的一些银号、企业等,都纷纷撤至上海、成都、西安等地。各家经理多带领少数职员等逃亡各地,自行设法维持。阎达仁经手阎锡山的私人财产较多,阎锡山指示他要将其财产、资金分散开,以避免意外的损失。阎达仁即带领着太原亨记银号、天津亨记银号的少数职员逃往上海、成都、昆明、西安、兰州五处,更名为川记商行、松茂昌或达昌商行,均由阎达仁主持。上海松茂昌以张正庭为经理。德生厚银号由张雨田带领一部分职员逃至上海,暗中经营。该号另一部分职员由卢培庭带领,逃至成都,也仿效张雨田在上海的做法,暗中活动。源积成银号由徐西川带领该号职员逃到成都,更名合记商

行，由徐西川主持，以曲廷瑞为经理。这伙人分散到上海、成都等地，仍然是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而且多将所赚的钱纳入私囊。阎锡山虽有耳闻，因鞭长莫及，亦只得听之任之而已。1943年秋，阎锡山电令亨记银号阎达仁、源积成银号徐西川、德生厚银号卢培庭等，限期到达克难坡，要他们交待几年来的账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自抗战以来，每家跟随的逃难人员以及家属等入甚多，花费过大，虽有盈余，也随着就花用了，幸而各家将固定的资金还保存下来。随后，阎锡山就将三家的资金集中，人员合在一起，在克难坡成立了所谓“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军用实物补给处”，委任徐西川为主任委员（中将待遇）、卢培庭为委员（中将待遇）、阎达仁为委员（中将待遇）兼任实物补给处处长，并委我为实物补给处副处长（少将待遇），三家其余的人员共有45人，均分别委任为上校、中校等职。这个实物补给处在第二战区来说，是组织最大、官级最高的机构，但是各家经理人员，内心均仍感不满。他们既不敢违背阎的命令，而又忍受不了在克难坡的困苦环境和一些束缚。因此，他们一再请求阎锡山将军用实物补给处总处设于西安，在克难坡另设分处，既便于搜购实物，又便于补给首脑部物资的供应。阎同意这项建议后，徐西川等遂均去西安组成实物补给总处，克难坡的分处只留我一人。徐西川等到西安成立总处后，就干起倒卖黄金的勾当。那时在西安、昆明、成都等地黄金的价格，较山西吉县、乡宁等地为低。徐西川等即由西安、昆明等地购买黄金，利用补给处的名义掩护北运。后来徐西川派来王茂生、徐隆和、康振全、宋遥峰等四人，带有黄金50条和实物补给总处的公函，嘱我派人到吉县，把黄金按敌区的价格出售，价款速由山西省银行兑至西安。我偕王茂生到吉县将50条黄金悉数卖出，只留下一条黄金的款计700余万元，就以这项现款，在吉县成立实物补给处分

处。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实物补给总处完全是以买卖黄金为业务，从中捞取暴利。最使我奇怪的是，每次从西安运到吉县五六十条黄金，内有一半是阎志敏（阎锡山的四子）的，另有10余条是沈丽萍（阎达仁的姨太太）的，而实物补给处的黄金不过20余条。这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军用实物补给处”在表面上虽然是个军中的机构，而实际上不过是阎锡山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组成的投机机构罢了。

（二）阎锡山资产的分散和集中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首先将阎达仁经营的亨记银号的财产，以“狡兔三窟”的方法，分布在兰州、西安、成都、昆明、上海等地。兰州由李良师负责，西安由刘懿轩负责，皆用川记商行的名义分别保管一部分。成都由曲时斋、王荫棠二人负责，昆明由冯子久负责，皆用达昌商行的名义分别保管一部分。上海由张正庭负责，用松茂昌的名义保管一大部分。以上各地的商号，统由阎达仁担负总责，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成都之间，并以函电指挥兰州、西安、昆明等地的负责人。分散于各地的负责人，在初期因人地生疏，不敢出头露面做生意，后来见到有机可乘，遂做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生意，大发国难财。

1941年间，阎锡山与日寇勾结妥协时，竟认为他私人的财产放在西南一带大后方，不如放在日寇占领的地区可靠。因此，他命令阎达仁加紧将分散在后方各地的财产集中于上海，统由上海松茂昌号张正庭保管。张则利用这一大批横财，在上海另行组织川记商行、达昌商行、松茂昌等商号，大肆投机，囤积居奇。

1942年阎锡山与日寇秘密举行所谓“安平会议”时，借故逃走。日寇随即一面派出大批飞机，轰炸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克难坡，一面命上海日寇宪兵队将张正庭逮捕，非刑拷打，迫令交出他所保管的阎锡山的全部资产。

张正庭经日寇宪兵队释放后，于1944年去山西克难坡，向阎锡山报告说，大部分物资都已被日本宪兵队抄没，仅剩下一些日寇所不知道的少数物资。阎仍甚怀疑，即将张交与他手下的特务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的执行部办理。该执行部主任梁化之（梁与张同是定襄县人）询问了张正庭后，即囑张返回上海，恢复松茂昌的营业，由张继续经营。

抗战胜利以后

（一）阎氏家族末期经营的商号企业

1. 晋丰银号原系崞县巨商富户集资在太原所设的银号，经理为郝星三。郝星三的儿子徐桂英（郝振邦之妻）系阎锡山内弟徐玉峰之女（徐玉峰是我的姐夫）。因此，郝星三和阎锡山就拉上了亲戚关系。日寇投降后，阎锡山依靠日寇的协助，抢占了太原，委任梁缜武（阎锡山的五妹夫）为山西太原社会处处长兼接收敌伪产业委员。阎将接收的敌伪财产和银行现金等，在太原成立新兴银行。该行开幕一年之久，因格于蒋政府规定，未获备案，而晋丰银号却符合复业的条件，并已取得复业的执照。阎锡山就撤销了新兴银行，使用晋丰银号这个字号，扩大组织，由梁缜武任董事长，续子宪任总经理（续当时任天津金城银行副理），郝星三任经理，边廷途任协理（边系太原外事处处长），续承明任副理。此后，阎锡山即派梁缜武常驻上海，一面将他40年来在山西剥削、压榨人民积累起来的大批资金，由梁代其存入美国银行，以期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一面由梁在上海进行一些政治活动。嗣后，晋丰银号派于润之前来天津，担任该号驻津主任，在津申请了商行营业执照，进行黑银号的活动。

2. 太原晋裕银号经理冯子久在抗战胜利后，即常驻上海，亦进行黑银号活动，运用大量资金，套购黄金、美钞，为阎锡山

攫取暴利。

3. 阎锡山利用潜伏在天津之希特勒纳粹分子颜宁司、恩格尔、林登堡等人，在天津成立同记公司，任王俊士为经理，在颜宁司、恩格尔、林登堡等协助下，做一些进出口业务，并派贾乙和为太原同记公司经理（贾乙和彼时担任第二战区会计处处长）。

4. 阎锡山在太原、天津设立了庆兴公司，分别任曲宪南、崔玉亭为经理，运用太原的资金，在天津购存一些面粉、纱布、黄金、美钞等。

5. 太原和天津两地的物产商行，均系阎于胜利后设立的企业。太原物产商行任李符之为经理，天津物产商行任禄子修为经理。这两处商行的主要业务，系由太原收购生漆、桐油、桃仁、皮毛等运至天津销售，另由天津购买太原所缺乏的物资，运回太原出售。

6. 元丰银号曾派郭映渊为该银号驻津主任，申请商行营业执照，进行一些汇兑和购存黄金、美钞等活动。

7. 太原运输公司经理王尊光、驻天津运输公司经理牛锦章，为了开展运输业务，成立了运输公司。在解放战争期间，交通阻隔，王尊光等遂改做投机倒把的活动。

（二）阎锡山勾结陈纳德，投资航空公司

1947年美帝国主义撕破“调处”的假面具，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以后，阎锡山就积极活动起来，加紧充实军用物资，并派梁缜武在上海活动。那时美国公民陈纳德计划在上海组织航空公司来垄断中国的航空事业，并暗中示意需要有中国人参加，始可照准。梁缜武知道这一消息后，就立即报告阎锡山。阎认为这是和美国合作的好机会，就向陈纳德组织的航空公司投资现洋100万元，成为这个公司的大股东。阎锡山后来派其第二战区交通处处长朱点到上海和陈纳德联络，用

飞机向太原运送物资，并要求将天津、北京、太原、西安、汉口等地阎私人及公家的财物均空运至上海，交与朱点保管。至于各地的现金，亦均汇至上海集中。

(三) 阎锡山汇存美国的一笔巨款

1946—1947年间，山西省银行驻津主任阎孝先在津为阎锡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于天津大陆银行保险库内。嗣即遵照阎的指示，汇了一笔到美国，为数约有150万至200万美元（确数记不清），说是作为他的儿子阎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费用。该款由我和阎孝先会同天津公懋洋行会计长韩纳士（德国人）三人去大陆银行保险库取出美金现钞，点交与韩纳士汇出的。阎锡山四子阎志敏、四儿媳裴炳、五子阎志宽及孙女阎树蓉四人，系于1947年由上海乘轮去美国的。

* * *

附记：关于本文资料来源，说明如下：

1. 阎锡山用绑票方式勒索的30万两银子一事，系大德通银号经理许敬甫提供的材料。

2. 太原晋丰银号将新兴银行合并扩大组织，系于润之提供的材料。

3. 关于晋裕银号出资在大同、忻县、临汾设立当铺事，系土货商厂售货员秦宝斋提供的材料。秦现任山西工业厅沈阳办事处主任。

4. 关于阎锡山其他一些经济活动，是根据我自己的所见所闻。

（阎子奉口述 唐克明整理）